

近代史学刊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章开沅 严昌洪 主编

第7辑



YZLI0890122692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主办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近代史学刊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章开沅 严昌洪 主 编

(第7辑)



YZLI0890122592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主办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史学刊. 第 7 辑/章开沅 严昌洪主编.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622-4754-8

I. ①近… II. ①章… 严… III. ①中国—代近史—研究—丛刊 IV. ①K25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6986 号



近代史学刊 第 7 辑

主 编: 章开沅 严昌洪◎

责任编辑: 王中宝

编 辑 室: 文字编辑室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 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 027-67863291

网址: <http://www.ccnapress.com>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 320 千字

开本: 880mm×1230mm 1/16

版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数: 1—1000

责任校对: 方汉交

封面设计: 罗明波

电话: 027-67863220

电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督印: 章光琼

印张: 14.5

印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近代中国城乡社会研究

- 卢汉超:中国文化中的小城镇情结及其现代意义 1
- 任放:近代中国乡村研究的社区范式 20

辛亥革命研究

- 〔日〕藤谷浩悦著 梁紫苏译 罗福惠校:1906年萍浏醴起义与民众文化
——以中秋节谣言为中心 31
- 罗福惠、郭辉:谣言对清王朝统治的挑战 47
- 瞿骏:造报、阅报与毁报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报 57
- 刘继华:基督教传教士与陕西辛亥革命
——以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为中心的探讨 75

2009年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优秀论文

- 任智勇:晚清财政开支的另一种面相
——以三成船钞为例 84
- 李里:1920年—1953年湘鄂川黔神兵组织初探 99
- 赵国壮: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川沱江流域蔗农农家经营模式研究 115
- 朱海嘉:战时国民党对民众团体的管控政策研究
——以重庆市党政联席会议为中心的考察 139

专题研究

- 许小青:张其昀与南高学派 151
- 付海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司法组织的制度变迁
——以鄂东为个案的历史透视 169
- 章博:试论华中大学保持基督教特色的努力(1931—1951) 184
- 黄永昌:清代江南的阻葬问题与社会调控 197

书评

- 吴兴星、何芳:一部推陈出新的中国近代史教材
——评章开沅、朱英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 211
- 王建伟:北伐前后一场独特民众运动的多重视角分析
——读冯筱才《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 216

中国文化中的小城镇情结及其现代意义^①

卢汉超

内容提要 在中国城乡鸿沟之间的是众多的小城镇，它们亦城亦乡、非城非乡、半城半乡。中国的精英阶层，特别是士绅文人们，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小城镇生活方式的依恋情结。这种依恋情结在近代中国形成了一种可称为小城镇情结的东西。这种心态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但另一方面，它也帮助保留了大城市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失去的一些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小城镇情结在现代社会普遍存在。英国杰出的都市计划专家贺华特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提出的关于花园城市的设想，其主旨就是使城市在保留自然环境、提升社会生活的同时，不失提供工作机会的功能，与中国的小城镇生活方式颇为相同。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展，过去士绅等社会中上层理想和实践中的小城生活，可能会在喧嚣的大城市的郊区找到它的影子；而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也会在城乡之间、小城之内重温旧梦，找到他们真正的家园。

关键词 小城镇 城市化 城乡关系 近代化 中国文化

在当代中国，由于巨大的城乡差别，一般民众对城市生活趋之若鹜，人们似乎很难想象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岁月里，城市（包括大都市和小城镇）在百姓的心目中并非一定高于乡村。西方学术界对此现象有个说法，叫作传统中国的“城乡连续统一体”（rural-urban continuum）。城和乡相当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关系远非对立。这个统一体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解体。城市和乡村渐渐成为两个对立而且差别巨大的范畴^②。

^① 本文的主要内容曾分别在美国哈佛大学2006年10月6日—8日举办的当代中国城乡差别学术研讨会和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7月4日—5日举办的第三届城市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② 城乡统一连续体的概念最早由学者们在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所编的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一书中提出，见该书的导言及 Skinner, Mote, van Der Sprenkel 等人的章节（第102~103页，第258~261页，第609页）。刘翠溶利用族谱所作的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化研究也可为此模式佐证。该研究发现，在江南一带除了城里男性的再婚和多妻现象略多于乡村外，城乡居民在生育、死亡、节育等方面的行为上几无差别，见刘翠溶：《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都市化之发展与人口特征》，载梁庚尧、刘淑芬主编：《城市与乡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285页，本文原载《经济论文》1986年第14卷第2期。

当然,在近代以前城乡差别早已存在,而且与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情况一样,城乡居民往往彼此看不上眼。中国的大众文学中有不少嘲笑乡巴佬的故事^①,而在农民心目中对城市和城里的市民也是不敢恭维。历史学家 Mark Elvin 曾这样形容中国农民心目中的城市:“农民们有点怕城市。一个清朝官员写道:‘农人惧进县城,畏官如畏虎。’城里是交税租的地方、是打官司的地方、是‘市霸’之类欺负农民的恶棍横行的地方;灾荒时,城里又是卖儿鬻女的地方。”^②从另一角度来说,中国文学中赞美理想生活的文字,无论是出自儒家的完美主义或道家的出世思想,绝大部分都是以田园乡村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里这些来自城乡双方的“傲慢与偏见”不过是中国丰富多彩的大文化的一部分,它们本身并不足以形成后来人们在近现代社会中看到的那种无处不在的城乡鸿沟。

这个古老的文化结构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被无可逆转的工业化打破了。近代化了的的中国城市开始为人们提供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致富前景、新潮文化和工业社会所带来的便利的生活方式和享受。在某种情况下,近代城市还为政治异议者提供讲台,为不容于当局者提供庇护。这些都是到那时为止闻所未闻的新事物。与此同时,晚清和 20 世纪初农村经济的破落萧条进一步加深了业已扩大的城乡差别,而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城市,这样一来就更把乡村抛在后头了。

在中国城乡鸿沟之间的是众多的小城镇,它们亦城亦乡、非城非乡、半城半乡。几十年来学术界对明清和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做了大量研究,其中也涉及小城镇,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城镇^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希望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小城镇遗产。据我看来,中国的精英阶层,特别是士绅文人们,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小城镇生活方式的依恋情绪。这种依恋情绪在近代中国形成一种可称为小城镇情结的东西,用芮玛丽(Mary Wright)的话说,它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立身之地”。小城镇心态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但另一方面,它也帮助保留了大城市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失去的一些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① 参阅 Wilt Idema 在哈佛大学 2006 年 10 月 6 日—8 日举办的当代中国城乡差别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Putting Peasants in their Pla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thinking the Rural-Urban Cleava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October 6-8, 2006.

② 见 Mark Elvin, “Chinese Cities since the Sung Dynasty”, in Philip Abrams and E. A. Wrigley, eds., *Towns in Societies: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79-89.

③ 以下是有关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几部重要中文著作: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赵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社 1995 年版;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和《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 1993 年版;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有关日本学者所作的中华帝国晚期城镇研究,可参阅 Linda Grove and Christian Daniels,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Ming-Q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4.

什么是小城镇？

小城镇是一个使用很广而又缺乏严格定义的概念。一般来说，在中国的城乡架构中小城镇是指县城以下的市镇。早在北魏（386—534）作为军事据点的镇就出现了。7世纪后唐朝驻军的镇将为了控制地方资源，往往扩大权力，兼刺史和太守之职而管理行政，而镇也就有了贸易集市的功能。宋元以后，镇一词慢慢演变成专指比农村一般墟市大一点、更加固定、非行政中心而又市场集中的一个街区^①。虽然镇不是一个行政级别，各朝代也还在一些重要的镇上派驻监镇官以维持地方治安和征税（例如酒税）。在近代小城镇主要是用来指镇一级的行政区或地理概念。如果套用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模式，我们一般所说的小城镇应可包括该模式中的“中间市场”（intermediate markets）、“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s）和“地方城市”（local cities）。按此标准，中国在19世纪末有大约11000个小城镇^②。

中国的县城一般都有城墙，这是县城和县以下城镇在外观上的一个明显区别。但县城在规模上不一定就大于行政上隶属于它的城镇。有些城镇人口集中、经济繁荣的景象远过于县城^③。例如20世纪初江苏宝山县所属的13个城镇中，只有1个城镇的人口少于宝山县城，而宝山县所属的罗店镇人口几乎达县城的五倍之多^④。浙江省湖州府的南浔镇在1860年有将近四万人口，其繁荣程度远过于湖州，当时的俗谚云“整个湖州城，不及南浔半个镇”^⑤。其实这种现象早就存在，例如江苏吴江县的同里镇在明朝初期所缴纳的税就超过湖州城^⑥。所以县城州府的所在地也有可能属于小城镇范围。一般来说，人口一万以下的县城州府也是小城镇^⑦。

镇这个字常用于组合词中，如市镇、城镇、乡镇等。其实这些词组也已表明了镇的城乡二元性质：市镇、城镇与城有关，乡镇则显示出镇的农村性质。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如此总结这种情形：“我早年在农村调查时就感觉到了有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实体用一个普通的名称加以概括，称之为‘小城镇’。”^⑧显然，费孝通无法给小城镇一个明确肯定并有量化基础的定义。他所说的

① Gilbert Rozman, *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31.

② Skinner, "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87.

③ 关于1949年以前中国的人口和城市问题，可参阅 Hsiao-tung Fei, *China's Gentry: Essays on Rural-Urban Rel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p. 91-107.

④ 张允高，钱淦等：《宝山县续志（1921）》第1卷，第178页。

⑤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28年版，第122页。

⑥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2页。

⑦ 赵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142页。

⑧ 费孝通：《论小城镇及其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小城镇概念是基于常识或者是一种行之久远的通俗而又实际的说法。这正反映了给小城镇定义上的含糊性质,而这种含糊性质揭示了小城镇自身的双重性和可变性,即上面提到的“非城非乡、亦城亦乡、半城半乡”的状况。这也使研究小城镇成为研究中国城乡问题的一个极富意义也饶有趣味的课题。

在当代中国,小城镇在城乡行政分层中的正式名称是“建制镇”,指经法律程序正式建立行政管理体制并报经国务院审批备案的镇,是隶属于县,与乡同级的小行政区。但是所谓“建制镇”的标准在半个世纪中常常变换,主要根据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而由国务院决定。改革开放以来,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经济,促进城市化,国家的政策是鼓励小城镇的发展,故“建制镇”在最近一二十年迅速增长。虽然对发展小城镇的政策有疑虑,有批评,也有担心小城镇的过分发展会造成泡沫经济,但小城镇仍然发展迅猛。2003年底,中国已有19811个建制镇,建制镇的平均人口为32309。这些数字意味着小城镇的数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约翻了一番,而今日小城镇的平均人口已相当于一个世纪前所谓“巨镇”的人口^①。

返璞归真于小城镇

浙江省北部靠近太湖的南浔镇是一个丝绸的产地中心。1840年代后期,从上海出口的丝绸大半产自南浔。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特别是1860年代初,江南是重灾区,丝绸生产低落,但此后南浔的丝绸生产又回复昔日的繁荣。到1934年为止,从上海出口的丝绸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产品来自南浔^②。因此大量的财富聚集在这江南小镇。南浔本地人用一种形象的比喻,把财产超过五百万的家族称作大象,把财产在一百万和五百万之间的家族称作牛,把财产在十万和一百万元之间的家族称作狗。根据这些标准,南浔有“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这种形象的说法在浙东一带广为人知,而南浔的富户实际上还不止此数^③。

然而,尽管南浔在1870年代到1920年代富可敌国,这半个多世纪中它却仍是一个小城。事实上,以人口而论,直至1980年代,南浔的人口,包括周围的乡村,从未超过四万人。小镇的规模在1980年代末以前也没有大的变化,一直不大^④。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及人造丝的发明使人们对丝绸的需求大为减少,对南浔这样一个以丝绸为业的地方来说,这不啻是釜底抽薪。南浔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衰落,此后的中日战争、国共内战,在在都阻碍了小城的发展。南浔在20世纪30年代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湮没无闻,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稍有振作,不过只是作为江南的旅游小镇之一。直到1992年,南浔的人口约达43000,只是稍稍超过了它在一个世纪前的居民人数^⑤。

① <http://www.chinanews.com.cn/2003-10-19/358685.html>.

② 南浔镇志编纂委员会编:《南浔镇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85~86页。

③ 见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28年版。

④ 南浔镇志编纂委员会编:《南浔镇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⑤ 南浔镇志编纂委员会编:《南浔镇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并非仅南浔一例。黄宗智曾经指出：“丝绸、棉花和米市是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城镇飞速发展的动力。”^①基本上，这种发展的主要特点不在于大城市的发展，而在于星罗棋布的小城镇的出现。从17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江南一带镇一级的小城数量急剧增加，但城镇的规模却未有明显的扩大。江南有不少小城镇在贸易上与全国其他地区有密切关系，有些小镇还与国际贸易相连。但是从小城镇发展成一个县城的例子却不多，发展成大城市的更是绝无仅有。

当然，经济繁荣的小城镇不是必定往大城市方向发展，或非得成为行政中心不可。但是，明清时期江南有这么多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市场相连的繁荣小城镇，却几乎没有一个小城镇发展成为一个略具规模的现代城市，我们就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了。对这个问题通常从经济史的角度加以回答，即明清中国城镇的发展基于农作物和手工业，而非大工场作业。中国的历史学者称此为资本主义萌芽，并对萌芽为何没有充分发展成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几十年的讨论^②。再以南浔为例，它的财富集聚基于丝绸贸易，一旦丝绸贸易萧条了，这个城镇也就没落了。同样的模式也适用于其他以粮、棉、丝绸、陶瓷等致富的所谓专业城镇^③。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近代上海的崛起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和资金，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该地区其他城镇的独立发展。

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受到限制还有文化上的原因。在城乡差距拉开的时代，小城镇为社会精英阶层中依恋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保守人士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在小城镇的环境中他们可以继续行使传统的乡绅权力，投资农业，享受豪华生活，发展士大夫文化。在这种图景中发展现代工业几乎不在视野之内。南浔镇志称该镇巨户“发家致富后，在故里建宏大宅第。置田地房产，筑庭园书斋，以及捐资筑路造桥，兴办教育等社会公益”^④。但就是没有重要的现代工业投资，尽管时代已到了20世纪。

19世纪末，中国城镇人口中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小城镇（包括人口一万以下的县城）^⑤。这些居民虽然住在城里，其实却是城乡之间的“边缘人”。众所周知，小城镇四周是乡村，这些乡村和中心城镇组成施坚雅模式中的所谓六角社区，或者用中国老百姓的颇为生动的语言来说，每个小城镇都有它的“乡脚”^⑥。这些住在乡脚的农民视小镇上的居民为“街上人”。这里的“街”所表达的含义是一般乡村没有的那种中间路面铺平，两边商店林立，甚至还有行道树的小马路。大部分小镇都是仅此一街或两街而已，但已足使乡

① Philip C. C. 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48.

② 例如几年前《亚洲研究季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关于彭慕兰《大分流》一书的辩论。就地区而言，辩论集中于长江下游地区。见该刊第61卷第2期(2002年5月)，第501~662页。

③ Lu Hanchao, "Arrested Development: Cotton and Cotton Markets in Shanghai, 1350-1843", *Modern China*, Vol. 18, 1992, pp. 468-99.

④ 南浔镇志编纂委员会编：《南浔镇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⑤ 中国小城镇人口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明显高于日本和英国。19世纪英国城市人口中的74%、日本城市人口中的71%住在大中城市，而同期中国城市人口中仅49%住在大中城市。见赵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台北联经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142页。

⑥ 费孝通：《论小城镇及其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1页。

人侧目。而大部分住在大城市的人们则对小镇居民和乡村居民不烦区别，统统称之为“乡下人”。随着都市优越感在近代中国日渐普遍，有关城乡差别的感觉也就越发敏感起来，而小城镇的人们在城乡之间的自我定位就有点微妙。浙江大学近年的一份小城镇调查发现几乎所有被采访者都强调自己是“镇里人”或“街上人”，以区别于“乡下人”。与此同时，他们也很犹豫称自己为“城里人”。这种微妙的感觉由来已久，至少从20世纪初就很明显了^①。但是这种微妙的感觉有一定的阶级性，它在上层人物中就不明显，甚或不存在。与一般民众相比，由于生活在上层，经济地位又巩固，地方士绅和富商们就不大在乎城乡的身份认同问题。事实上，大城市越工业化，社会人情越淡漠，介于城乡之间的小城镇就更成了许多保守人物的安乐窝。城市总是比小城镇多元化，而在大城市中，只有真正有大势力者，如上层官僚；或敢于无法无天者，如帮会头子，才能出人头地、称王称霸，一般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士绅富商，往往与大城市格格不入，或觉得自己在城里不过是个小人物。而回到老家，则顿然如鱼得水，觉得找到了归宿。小城镇的中心人物是当地的所谓巨姓大族。在1905年中国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前，这些巨姓大族来自有功名的士绅阶级，也包括一些经商致富的大户人家，即普通称作绅商的阶层^②。如张仲礼所言，作为一个团体，中国士绅将“自身与促进和保护他们家乡所在地域的利益联系起来”，他们在家乡一带的“文化领导包括所有儒教社会的价值观”，同时也通过在地方的各种活动而在物质生活上表现出来^③。此处所言“家乡一带”当然不止是地方上的城镇，但城镇显然是士绅们发挥领导作用的最便利之地。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言中国农村存在着一种将各类组织和原则结合在一起的“权力的文化纽带”。杜赞奇所言各类组织和原则“包括家族和市场组织中的各种分合及其层次。这种分层可以是地区的，其成员享有归属性的权利，例如庙宇组织。这种分层也可以是自愿型的，例如水利和商人组织”^④。显而易见，比之分散的乡村，这类地方权力在小城镇更能有效地施展。

置买田产是士绅富商传统财产投资的主要方法。直到20世纪初，中国商人在投资上的指南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⑤。置买田产总是在家乡或家乡附近。通过拥有田产，地主便自然成了地方上的上层人物。镇上稍具规模的店铺商行也通常由在乡间拥有田产的地主经营。这些头面人物也是地方上的慈善和公益事业的主要发起人、赞助者和主持人。但是，能够把城镇和周围的乡村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往往不是表面上难以识别的田产，而在于可称为文化设施的东西，诸如庙宇、牌楼、私家园林、艺术收藏、图书馆、私塾和学院等。这些文化设施往往精心制作，耗资不菲，有些相当豪华靡费，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消费性的开支中的大项。

① 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页。

② 其中最著名的是盐业中的徽商和金融业中的晋商。

③ 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p. 51.

④ Duara, Prasenjit,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5-16.

⑤ 杨晓民：《徽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以末致富，以本守之”一语源于司马迁《史记》第129卷，《货殖列传》第69卷，原作“以末致财，用本守之”。

明清时期中国富有阶层耽于消费享受、除了购田置屋，不事生产投资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他们的财富用于提升本家族在儒教社会中的地位，诸如族中子弟的应试赶考、平时地方上的修路筑桥、教育公益、年成不好时的救荒赈灾，等等。成功的商人，不管住在通邑大都或地方小镇，往往喜欢将财富用于奢华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设施。众所周知，中国的主流文化崇尚节俭。较不为人知的是，中国文化中也有认为惟能消费者能致富的十分新潮的观点。江苏松江的陆楫（1540 年左右）曾大胆宣称：“余每博观天下大势，大抵其地奢则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也。”“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①与陆楫同时代的苏州人顾公燮也有同感：“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②这种思想显然有利于促进消费文化；反过来看，它也是当时江南奢华生活方式的一种思想产品。

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种奢侈消费的社会习俗根源于耀祖扬宗，荣归故里，在外发财致富如不回乡，则如“锦衣夜行”，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思想^③。这种衣锦还乡的心态和举动当然不只是对小城镇而言。对家族和祖籍的眷恋以及耀祖扬宗的愿望在中国城乡各地都极普遍，但小城镇以其介于城乡之间、不大不小的地位，更容易把这种愿望和行为诠释得淋漓尽致。以明清时期最活跃的徽商为例，即使他们在外多年，仍难认同家乡以外的文化。在扬州经商和居住几十年的徽州商人，在户籍上早已正式注册为扬州人，但每个徽商都只将扬州作为羁旅之地，把自己看作是在家乡外的“流浪者”^④。无数的银子往家乡寄去，在徽州建造了大量的民宅、庙宇、祠堂、牌楼、私塾、学院，使这一带成为帝国晚期文化遗迹最富的地区之一。即使经过了 1860 年代初太平天国的大浩劫，以及一百年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徽州各镇乡村仍以古建筑知名于全国^⑤。出远门经商而不忘故里的另一个著名例子是晋商。山西的商人往往一辈子在外飘泊，许多远至塞外蒙古，忍受异域的风霜，但仍源源不断地在家乡建屋。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⑥。许多民居可称豪华，现存最有名的晚清时代建的乔家大院，由 20 个院落组成，有 313 间屋，仅烟囱就有 140 个。山西一省尚存的明清古建筑近 3000 栋^⑦。虽经中国的动乱，至今尚有 1300 栋明清时代的古老建筑幸存下来。

① Lien-sheng Yang, "Economic Justification for Spending: An Uncommon Idea in Traditional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0, 1957, pp. 36-52.

②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见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9 页。

③ 如《史记·卷七》：“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耳！”

④ Antonia Finnane, *Speaking of Yangzhou: a Chinese City, 1550-18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 Center, 2004, p. 239.

⑤ 有关徽州民居，可参阅 Nancy Berliner, *Yin Yu Tang: the Architecture and Daily Life of a Chinese House*, Boston: Tuttle Publishing, 2003, 第 3 章以及杨晓民：《徽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3~126 页。

⑥ <http://www.sina.com.cn>, 2007 年 02 月 28 日 11:41 登录。

⑦ 《晋商》，中国青少年音像出版社，第 28 页，第 39 页。张艺谋 1991 年导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即以乔家大院为主要拍摄场地，参见梁小民：《小民话晋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82~287 页。

在长江三角洲,小镇上枕河而筑、青瓦白墙的两层楼房是这一地区标志性的传统民居。这些楼房绝大部分是普通百姓的蜗居,其中却也不乏在外事业有成、但以家乡小镇为乐土的士绅阶级或商人的住宅。近年来这些江南民居成了人们怀旧的对象,其中有一部分建筑还保留相当完好。当代诗人白桦说:“不知道为什么,每当我见到今日幸存于世的古代建筑,都欲哭,欲歌,如梦,如幻……”^①激发这位河南籍诗人发这通感慨的是南浔镇明代幸存至今的普通民居“百间楼”,相传由明代礼部董尚书(1510—1595)为孙媳妇陪嫁而来的婢女仆从而建。诗人也许会容易动情,多愁善感,但这些民居的魅力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各地古镇成了旅游热点,主要的吸引力也是来自明清乃至民国时代普通的民居^②。

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如梦如幻的建筑不是百间楼这样的普通民居,而是优雅的私人花园,荣耀的牌坊,或是辉煌的庙宇。Tobie Meyer-Fong 在她对扬州的研究中注意到了建筑的象征意义和附在楼台亭阁上的价值观^③。南浔虽然远小于扬州,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脉相承。小镇的面积不大,兴盛时却有 24 座精致的花园,其遗迹至今仍历历可数。仅有清一代,南浔就造了 160 家私人豪宅,外加 16 座花园。从创业的刘墉起,刘家三代人前后花了 40 年的时间(1885—1924)修建了一座占地 27 亩、叫作“小莲庄”的私人花园。这座花园的建筑很典型地反映了士绅富商阶级在这大变化时代的小城镇心态。刘家是房地产大王,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最好的地段拥有高级住宅和几百栋里弄房子,刘家许多人也在上海居住。但他们真正视为家园的却是小莲庄。刘氏族谱中明确写道,小莲庄是刘家的根,刘家的后世子孙中有“以一树一石与人者,非佳子弟也”^④。

小莲庄只是刘家在南浔建设的许多文化设施之一。这个私人花园曲径通幽,连接到更为珍贵的嘉业堂藏书楼。该藏书楼由刘墉的孙子刘承干用继承下来的家产置办,花了他一生的心血。1924 年,刘承干花了十二万银元建立了这个图书馆。此后的八年中,为了收藏善本书和印刷出版珍贵稿本,他几乎用完了刘家的财产。嘉业堂成了屈指可数的中国最佳的藏书楼之一。有好几次为了买书,刘承干卖掉了刘家在上海的整条弄堂房产。鲁迅称刘承干是有钱人家的“傻公子”,说“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⑤。刘承干的例子不同寻常,但也并非绝无仅有。小城镇上常有藏书极富或古玩珍宝搜集不菲之家。南浔一个镇上,在晚清民国之交时,至少有三家颇具规模的私人藏书楼。1949 年以后他们都进了中国主要的国家图书馆的特藏部^⑥。

私人庭院之外,荣归故里最显著的标志是牌楼。在一般民居只有一二层楼高的时代,这些装饰讲究、耸然矗立的牌楼有些是皇帝钦赐的,往往用来表彰地方上的慈善捐赠。南浔两座最著名的牌楼,分别建于 1895 年和 1908 年,就是光绪皇帝御准建立的,以表彰刘

① 张建智:《嘉业南浔》,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0 页。

② 例如最近出版的《中国古镇游》丛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将 190 个古镇列为旅游点,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为民居。

③ 周庆云:《南浔志(1922)》第 9~11 卷。

④ 《南浔刘氏支谱》第 5 卷,第 41 页。

⑤ 鲁迅:《鲁迅杂文书信选》,福建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5 页;鲁迅:《鲁迅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68 页。

⑥ 南浔镇志编纂委员会编:《南浔镇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4~247 页。

家多年来的赈灾贡献。离南浔镇 16 英里的吴兴城里，有一条不足半英里的街上竟立了约 50 座御赐牌楼。这些石头制造的牌楼留存了下来，大量木结构的牌楼就随着岁月流逝而消失了^①。

桥梁是地方士绅和精英阶层留下来的另一种遗产。修路造桥是地方富户们最通常的社区服务和慈善贡献。在河网密布的江南地区，桥梁是许多小城镇的最基本的设施，而造桥的经费中绝大部分得自于地方士绅和富户的捐献。日本学者川胜守（Kawakatsu Mamoru）曾对江南 25 个小镇上自宋代到清乾隆年间所造的 373 座桥梁作过一项研究，结果发现政府出资和地方社区出资建桥的比例是 13 : 153^②。仅是南浔一地在 19 世纪中期就建了 111 座桥梁，绝大部分系地方上出资建造。作家徐迟在 1947 年曾就南浔的桥梁作过一项调查，此时南浔镇已经大为没落，但仍有 88 座桥梁优雅地分布在整个小镇上^③。

“小桥流水人家”向来是形容江南小镇的经典句子。江南的黛瓦粉墙、柔风细雨、碧柳清荷激发了多少文人骚客的灵感和诗情。有关江南的经典诗句不胜枚举：“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白居易）“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杜牧）“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陆游）“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韦庄）“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皇甫松）这些美丽的诗句一代一代传下去，传颂了千百年。在这诗画般的意境中，现代工业真是大煞风景，无容身之地。而一代一代中国的士绅阶级和精英分子则在如诗如画的意境中找到了他们的精神归宿。

小城镇与上海

精英阶层对小城镇的钟爱在一定程度上为 20 世纪初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继承下来。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在经济上通常并无衣锦还乡的实力，而且民国时期的作家们绝大多数住在城市而且是大城市里。但是小城镇情结还是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绵绵不绝。五四运动这一代的文人学者们对世界级的大城市上海和附近的江南小城镇有一种矛盾心理。讨论一下这种心理有助于了解中国文化中的小城镇情结。

江南小镇往往依山傍水，有的整个城镇就建在水网之上，由诸多的桥梁连成一体。与 19 世纪末起上海的巨大发展不同，直到民国时期，许多明清时代兴起的江南小镇建筑和布局还相当完好地保存着。20 世纪中国最出色的一些作家学者就有不少来自这样的江南小镇。青年时代他们走出家乡，到上海求学或谋职，有些也在上海成家立业，常居久安，其中还有不少人被称作“上海作家”。然而他们对上海并不认同，只将自己看作是这个城市的旅居者，而对家乡小镇则保持了终生不渝的怀恋之情，虽然他们成年后的绝大部分岁月都不生活在故乡。对故土家乡的眷恋怀旧本是人之常情，中外一律，西谚中也有“家为心之所系”（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一说，本不足为怪。但当中国文人或知识分子

① 据樊树志所作田野调查，见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5 页。

② 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 1999 年版，第 203~216 页。

③ 徐迟：《江南小镇》，作家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06 页。

常把对家乡的眷恋怀旧和对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的批评连在一起时，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怀旧问题，而是表达了一种价值取向，是一个文化现象了。下面试举几例。

作家郁达夫在上海居住，在那里写作、编辑、出版，乃至成名。但他对上海几乎从未讲过一句好话。他称上海为“物质文明的糜烂”的“魔都”，在那里“金钱的争夺，犯罪的公行，精神的浪费，肉欲的横流”令他窒息。日暮中，他站立在上海市中心豪华的一品香饭店朝西的露台上，看着华灯初放的街头，感觉到的却是“大都会之夜的威胁”^①。作为一种逃脱，他在家乡浙江富阳盖了一楼以作安乐居，但他的事业仍在上海。与郁达夫同时代的丰子恺，也是浙江人，对上海的观感也几乎一样。上海对丰子恺来说也是人心险恶之地。丰说他是“浙江乡下人”，而浙江乡下有一句描写上海的话，叫作“打呵欠割舌头”，极言“上海社会之混乱，人心之险恶，恶霸流氓扒手之多，出门行路之难；在路上开口打个呵欠，舌头会被割掉的”。在上海住过多年的丰子恺似乎也不认为这句俗话有多少夸张^②。

而作为对照，丰子恺却把他家乡的小镇形容得如伊甸乐园一般，坐落在“富有诗趣画意而得天独厚的环境中”。他的家乡是一个叫作石门湾的小镇（今属浙江桐乡市），丰子恺这样形容他在石门湾的小镇上的老家：“运河大转弯的地方，分出一条支流来。距运河约二三百步，支流的岸旁，有一所染坊店，名曰丰同裕。店里面有一所老屋，名曰惇德堂。惇德堂里面便是缘缘堂。缘缘堂后面是市梢。市梢后面遍地桑麻，中间点缀着小桥，流水，大树，长亭，便是我的游钓之地了。”^③ 1933年，丰子恺在上海、杭州等地旅居多年后，在石门湾的老家惇德堂后面建了一栋中国式的住宅，把全家安顿在这里，那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缘缘堂。丰子恺说：“我只费了六千金的建筑费，但倘若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把金谷园和我对调，我决（绝）不同意。”丰子恺后来出的三本散文集，都以“缘缘堂”为名。

即使在上海，丰子恺和他的家人也过着家乡般的生活。这在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上海是很普遍的现象。尽管上海以“摩登”出名，但绝大部分上海市民住在石库门房子里，过着类似小城镇的生活。对丰子恺来说，这正是上海这个城市吸引人的地方。他回忆在上海的弄堂生活：

……故住在乡间看似安闲，其实非常忙乱；反之，住在上海看似忙乱，其实非常安闲。关了前门，锁了后门，便成了一个自由的小天地。在这里面由你选取甚样风俗习惯的生活：宁波人尽管度宁波式的生活，广东人尽管度广东式的生活。我们是浙江石门湾人，住在上海也只管说石门湾的土白，吃石门湾式的饭菜，度石门湾式的生活；却与石门湾相去数百里。现在回想，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生活！

上海虽好，他仍然放弃了这种仿制的微型故乡生活，而决定回归石门湾。即使后来因为战乱，“缘缘堂”被日军炮火所毁，丰子恺飘泊流离，以后长期住在上海，他的心却常

① 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4卷，花城出版社，第27页（出版时间不详）。

② 丰子恺：《缘缘堂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09页。

③ 丰子恺：《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122页（出版地及出版时间不详）。

在故乡小镇。直到1969年，丰子恺还在一封给儿子的家信中说，“我无其他愿望，唯有‘求吾所大欲’——退休家居”^①。丰子恺的传记作者巴弥（Geremie Barmé）称丰为一位“艺术的流放者”，说“丰子恺被陷在左派和右派之间，既非进步，也不反动；在艺术上则既信奉新传统主义，又是一位改革者”^②。可以说至少在生活环境上，丰子恺在他的小城镇的家里，找到了思想的平衡点。

丰子恺这种在家乡小镇过半隐居的生活在那个时代颇具代表性。作家夏丏尊曾用两个男人的对话形式来描述这一代人骑墙于城市和乡间的尴尬和困惑。这两个男人都在大城市（夏丏尊显然暗指上海）工作，但家属却在乡间老家。他们两头奔波。虽然常住大城市，乡间的老家却并未衰落，人丁、房子反而有增无减。下面不妨看看他们对话中的几个片断：

我们现在都有两个家，一个家在都市里，是亭子间或是客堂楼、厢房间，住着的是自己夫妇和男女。一个家在故乡，是几开间几进的房子，住的是年老的祖父祖母，父母和未成年弟妹。因为有两个家的缘故，就有许多无谓的痛苦要受。

你说得对！我们现在有两个家，在都市里的家是工商社会性质的，在故乡的家是农业社会性质的。我在故乡的家还是新屋，是父亲去世前一年造的。父亲自己是商人，我出了学校他又不叫我种田，不知为什么要花了许多钱在乡间造那么大的房子。

我家的房子是祖父造的，祖父也不曾种田。——过去的事，有什么可说的呢？现在不是还有许多人从都市里发了财，在故乡造大房子吗？这都是社会的矛盾。我们生在这过渡时代，恰如处在夹缝之中。

那么你以为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知道我自己也不会把故乡的房子卖去。我只是说这是矛盾而已。感到这种矛盾痛苦的人，恐不止你我吧。^③

事实上，夏丏尊的这篇短文可以说是夫子自道。夏在上海住过多年，曾任著名的开明书店总编辑及编辑所长。他是那种对小城镇和乡村生活十分依恋同时又亲自感受到生活在工商社会和农业社会的矛盾的那类知识分子。1921年，他在家乡浙江余姚白马湖建了一幢平屋，把整个家搬到那里。夏视此为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他后来把杂文集称为“平屋杂文”。夏丏尊的散文《长闲》（写于1926年9月）可称是他在乡村小镇上生活的最佳写照。

另一位浙江人作家徐迟在他的著作中一口气用了66个“水晶晶”来形容故乡南浔之美。徐迟对家乡的挚爱使他用“江南小镇”来作他自传的题目，虽然他16岁就离开家乡到上海，此后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不住在“江南小镇”。徐迟的妻子陈松是他的南浔同乡。1947年他们在上海住了10年后重返故乡，徐迟纪录了返乡生活中的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半夜，陈松忽听到一点特殊的啾啾的声音，她从床上坐了起来。声音似在微微地移动。她拧亮了煤油灯，下床时，却踩到了一个什么软乎乎的东西，然后它迅速地消失了。这是一条有碗口那么粗的大蛇，但是据说是一条家蛇。陈松是知道这条蛇的。可能是因为它知道她回来了，这家蛇才又出现了一次，是专门回来探望她的

① 丰一吟：《我的父亲丰子恺》，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268页。

② Geremie Barmé, *An Artistic Exi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9.

③ 夏丏尊：《阮玲玉的死》，华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225页。

呢。不然，为什么我和其他人，竟会谁都没看到它的呢？奇怪的是陈松那么胆小一个人，这次却一点也不害怕、不惊慌，反而很喜欢似的。她说，“今天我看见了一条家蛇，我小时候就看见过它的。”^①

陈松对这条闯入闺房的大蛇的喜悦略略有点不寻常，因为即使在像南浔这样的江南水乡，在卧房里爬着一条大蛇还是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但陈松的反应是自然而由衷的，那个有关“家蛇”的传说也透露出民间普遍对家乡的恋情。诸如此类的热爱乡土的情感也可能导致一些有点奇怪的风俗。例如中国的谚语中有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上海的徽州人相信，如果得了脚气病，应该马上回家乡。一到了钱塘江上游，肿胀的腿就消下去，病就自然好了。生在上海浦东的胡适，祖籍在徽州，1907年，胡适在上海得了脚气病，他马上遵守家乡习俗，赶回徽州老家。胡适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最西化的人物，但对家乡的习俗却遵循有加^②。

画家朱屺瞻也曾叙述过他的故乡江苏浏河（一个离上海北边30英里的小镇）有一模一样的习俗。1909年朱屺瞻在邮传部上海实业学校读书，得了脚气病，下肢淋巴肿胀，发寒热，久治不愈，只得回浏河镇老家休养。一回到家乡，病就逐渐好转；病愈，再回上海继续学业，不到两个月，脚气病再发，支持不住，只能再告假回乡，再来个“不治而愈”。最后因脚气病感染又得了心脏病而不得不中途辍学，终于未能毕业^③。

对小城镇的感情并非专属于从江南小镇出来的知识分子。即使是与江南或小城镇毫无瓜葛的知识分子也有一种贬低上海、歌颂田园的情绪。梁实秋出生在北京，从未在小城长期居住过，但他在1923年对上海和离上海西南50英里的浙江嘉善作过一个有趣的比较。梁实秋是货真价实的“城里人”，生长在北京的一户殷实人家，此时正在美国式的清华大学念书。上海的繁华和西化却使他感到自己像个乡曲，格格不入。而他却将嘉善形容得如世外桃源：“二条街道，虽然窄小简陋，但是我走到街上心里却很泰然自若，因为我知道我身后没有汽车电车等等杀人的利器追逐我。小小的商店，疏疏的住房，虽然是很像中古时期的遗型，在现代未免是太无进步，而我的确看出，住在这里的人，精神上很舒服，‘乐在其中矣’。”梁实秋的结论是：“在大城市里，物质供给太便利，精神上感到不安宁的苦痛。所以我在嘉善虽然只住了一天，虽然感受了一天物质供给不便利的情形，但是我在精神上比在上海时满意多了。”^④

梁实秋远非盲目排外或不见世面之人，事实上他对这次不甚愉快的上海之行发了上述议论后几个月就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去了。他的这番议论反映的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怀恋小城生活的保守情绪。另一位有名的西化人物林语堂的城乡观与梁实秋如出一辙。林语堂曾在上海住过，并毕业于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他称上海是个“可怕的城市，极为可怕”^⑤。像丰子恺一样，林语堂将他的闽南故乡描写得如人间仙土。

① 徐迟：《江南小镇》，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614页。

② 胡适：《四十自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版。

③ 章涪陵：《草堂常春：朱屺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④ 梁实秋：《梁实秋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⑤ Lin Yutang, *With Love and Irony*,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40, pp. 53-54.

林语堂是20世纪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的最著名的学者，他坚称故乡的山水对他的人生观有决定性的影响。林在十几岁时，为了上学，常乘小舟从漳州坂仔到厦门，一次行程就花了三天时间。后来有了汽船，只要三个小时。但林说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花这么多时间在路上，因为故乡一代的风景铸成了他的性格，用林本人的话说，故乡的山水“足为我一生知识和道德的至为强有力的后盾……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秀美的山陵”^①。

这种故乡小城情结不仅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很普遍，在政治舞台上也不乏其人。中国人所说的“告老还乡”可以适用于在家乡以外谋生的退休回老家的任何人物，但在政治圈子里，它常用来指被迫下台，或以回归故里作暂时的回避，以退为进。20世纪上半期中国政治上最有权势的两位人物袁世凯和蒋介石，都曾退隐故乡，由于两人不久都重返政治舞台，他们的退隐故乡便被视作一种政治手腕。但其实在近代中国波诡云谲的政治舞台上，两人在退隐故里时对将来的政治前途都没有绝对的把握。而两人在各自政治生涯的低点回到宁静的家乡小镇生活时都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一点真诚的愉快。

1909年，袁世凯在摄政王载沣的逼迫下“开缺回籍养病”，在河南彰德（今安阳市）老家隐居。袁世凯当时有一张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在小舟上垂钓的照片，流传甚广，曾在上海《东方》杂志刊载，一般认为是袁故意给人一种超然世外的感觉，以迷惑他的政敌^②。但袁这一期间虽未放弃东山再起的愿望，却也准备在故里长居久留。他在彰德府城北门外的洹上村（以面临洹水而得名）修了大住宅，辟了各种果园、菜园、瓜园、桑园，还修缮了一座取名“养寿园”的花园，引洹水入园，将家人（包括其兄袁世廉）接来一同入住。此时袁世凯颇享天伦之乐。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对这段生活有一些生动的回忆：“我父亲喜欢吃的熏鱼，是二姨太太的拿手菜，她就常常养蟹，每个人都用高粱米和芝麻来喂养自己所有的螃蟹。等到秋深蟹肥的时候，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自己捕来自己吃。池内还修有一座水心亭，必须坐船才能到达亭上。每年夏季或月圆的时候，我父亲常和全家人划船过去，在那里吃饭赏月。他有的时候独自和我的生母三姨太太荡舟赏月。我母亲会弹七弦琴。这个时候，他对着皎洁的月光，听着悠扬的琴音，是十分高兴的。”^③

蒋介石也把家乡作为最后的避难之地。他在大陆的政治生涯中遇到两次最大的危难时，故乡溪口镇都是退居的首选之地。1936年西安事变后，惊恐未定的蒋马上回到这个离宁波西南20英里、人口不过二千、风景优美的小城住了三个月，并把他切齿痛恨的张学良也软禁在那里。在经过他政治生涯中最险恶的风浪后，蒋介石显然认为家乡是疗伤休养的首选之地，也是看管他那危险的下属的最安全的地方^④。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节节败退，蒋介石下野，再度回到溪口镇。他在那里的生活和40年前袁世凯在彰德老家的退隐生活颇有几分相像之处：

①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② 此照原载于《东方杂志》。参见Jonathan Spence and Anniping Chin, *The Chinese Century: a Photographic History*,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6, p. 54.

③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出版地及出版时间不详）。

④ 张学良首先被软禁在溪口的孔庙文昌阁，此建筑至今犹存。